



地方内生型产业发展的社会效应

——基于浙江诸暨山下湖镇珍珠产业的考察

钱 坤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南京 210037)

摘 要: 地方产业是乡村发展和振兴的重要基础, 但内生型产业长期发展的社会效应尚未得到充分探讨。文章基于浙江诸暨山下湖镇珍珠产业的深度案例研究, 剖析地方内生型产业塑造地方社会的机制与路径。研究发现, 地方内生型产业通过三重核心机制塑造了“结构完整的阶层分化社会”: 一是个体市场机会供给机制, 地方产业提供充沛的市场机会, 培育个体创业意识, 实现劳动力全年龄段吸纳, 形成“创业导向”的行动逻辑; 二是家庭资源积累机制, 地方产业显著提升家庭资源积累能力, 重塑了以“工—商”结合为核心的家计模式、良性代际关系及向上流动的发展型家庭再生产; 三是社会阶层分化机制, 市场竞争引致经济分化并推动社会分层。文章从产业和经济的视角揭示了地方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 有助于深化对地方“经济—社会”互构关系的理解。

关键词: 地方内生型产业; 市场机会; 家计模式; 阶层分化; 社会效应

中图分类号: F3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5)12-0724-08

The social effects of local endogenou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pearl industry in Shanxiahu town, Zhuji, Zhejiang province

QIAN Kun

(Faculty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Local industries serve as a critical foundation for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yet the social effects of long-term endogenou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main under-explored. Based on an in-depth case study of the pearl industry in Shanxiahu town, Zhuji, Zhe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through which local endogenous industries shape local societie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such industries forge a "structurally intact yet stratified social morphology" through three core mechanisms: (1) the individual market opportunity provision mechanism—by supplying abundant market opportunities, local industries cultivate entrepreneurial consciousness, enable all-age labor absorption, and foster an entrepreneurship-oriented logic of action; (2) the household resource accumulation mechanism—local industries significantly enhance household resource accumulation capacity, reshaping household livelihood models centered on "industrial-commercial integration", benig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al family reproduction for upward mobility; (3)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mechanism—market competition induces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and drives social stratification. By interpreting loc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lenses, this study uncovers endogenous dynamics of societal change, thereby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nomy-society" co-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

Key words: local endogenous industries; market opportunities; household livelihood models;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al effect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并发生深刻转型,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呈现出不同样态。从区域差异的视角看,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和东部地区流动,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长年在异地生活,使得乡村社会逐步异化为“无主体熟人社会”^[1],建立在共同的地缘、血缘关系之上的熟人社会逐步瓦解,乡村社会也演变为“半熟人社会”^[2]。中西部地区农村因人口大量外流而呈现“空心化”的样态,外出的流动人口在市场机会充沛的发达地区因市场获利能力的不同而出现了村庄外的经济分化。东部发达地区工业化、产业化进程加快且大量外来人口流入,本地农民可以就近便利地获取市场就业机会,地方社会的阶层高度分化并呈现“村庄里的分化”“富人在村”和“上层农民规模大”等特点^[3]。

围绕乡村社会的深刻转型,学者们主要从“社会”和“产业”两个维度分别阐释。乡村社会转型研究聚焦于乡村社会基本性质的变化,即“熟人社会”解体后的社会性质与形态,“离土中国”^[4]、“城乡中国”^[5]等概念便是对此的理论概括,但其表述对象多为中西部农村。此外,学者也关注到经济分化带来的社会分层,农村社会阶层已显著分化,各阶层在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等方面差异明显^[6]。而区域差异又使得农民阶层分化程度呈现不平衡性^[7]。我国东部地区因市场经济机会充裕,社会分化程度高于中西部,成为相关研究的重点。乡村产业发展研究则始于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带动的农村工业化进程的探讨,其间“苏南模式”^[8]等乡村工业化模式在实践中不断涌现。当时中国乡镇企业的成功似乎印证了费孝通的判断,即中国乡村产业会走出“一条与西方工业化迥然不同的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9]。

实际上,乡村经济(产业)发展与社会变迁构成系统整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互相影响、相互建构的关系。长期以来,学界更加关注乡村产业发展,学者们力图超越经济学范式,从社会视角阐释其社会基础。例如,对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原因,有学者将其归因于乡镇企业与乡土社会的紧密联系^[10];也有学者通过分析浙江乡村来料加工产业,发现其生产过程深度“嵌入”乡土社会,而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与社会伦理使其生产管理成为可能^[11]。但对于乡村产业长期发展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与塑造,相关研究却较少,其内在机制仍需厘清。本文试图通过对浙江省诸暨市山下

湖镇珍珠产业与社会形态的深度考察,厘清地方产业发展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机制与塑造路径,揭示地方社会变迁的动力。

一、乡村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角色与社会基础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乡村产业随之起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期前,乡镇企业曾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后,随着乡镇企业大规模转制,中西部乡村产业发展渐缓,东部则凭借地域与市场区位优势,推动乡村产业持续转型,成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乡村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一是探讨政府在其中的角色与作用,厘清“政府—市场”关系;二是探究其社会基础,厘清“市场—社会”关系。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产业的关系是产业发展研究的核心维度。政府在市场的构建与维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有学者用“官场+市场”理论解释中国特色经济增长机制及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模式^[13]。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源于“中央—地方”财政分权赋予地方政府的极大自主性:地方政府为在横向竞争中胜出,大举兴办乡镇企业^[14],甚至出现“逼民致富”现象^[15]。进入21世纪以来,地方政府打造辖区产业成为普遍现象,这是其基于产业发展制度安排与激励结构主动干预产业的行为,也是提升财税收入、争取项目资源、获取政绩的动力^[16]。尽管地方政府有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与自主性,但各地推动产业化的水平差异悬殊,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角色的分野:积极创新的引领型政府与保守稳妥的自发型政府,在产业战略、行动积极性、创新能力及政策利用等方面存在差异^[17]。精准扶贫阶段,产业扶贫虽为重要手段,却受项目制与科层制双重约束,导致结果出现系统性偏差^[18];而地方政府产业经营失败未引发政治风险,关键在于其通过与农户分配“项目控制权—经营自主权”,以更收敛的干预形成风险分担机制^[19]。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中扮演积极且高度介入的角色,但其干预效果常不及预期。

政府“有形之手”并非直接促成产业发展,其与地方社会基础的契合程度才是产业成败的关键。波兰尼^[20]的“嵌入性”理论强调,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系结构之中;White^[21]则认为,市场是企业及其他行动主体构成的自我再生产型社会结构,这些主体通过观察彼此行为逐步确立自身角色。乡村产业发展

的社会建构性,为“政府—市场”关系之外提供了新分析视角——从社会基础出发可重新理解地方产业的兴衰。正如有学者指出,乡村现代产业发展需顺应自身规律,核心是对接并嵌入当地现代社会结构,其成败取决于乡村社会结构微观层面能否实现农民现代化^[22]。焦长权等^[23]分析“晋江模式”时,便肯定了宗族文化、社会伦理与熟人关系对地域经济的推动作用,而这些基于家族、邻里组织的熟人关系网络及其文化伦理规范,正是通常所说的乡村社会基础^[24]。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后东部乡村工业的显著发展,根植于深嵌传统社会结构与规范的社会组织载体。付伟^[25]发现,特色产业生产组织的顺利运转,依赖于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与交往形态,这解决了其经营组织困境。内生型产业凭借本土廉价劳动力、稳定用工关系、灵活用工制度及村内产业分工集聚四重机制,深度嵌入乡村社会^[26]。村社集体在乡村产业发展中主体性较强,能依据组织资源与社情民意优化产业结构^[27]。这种乡村新内源性发展,本质上是村社集体作为产业转型核心主体,应对外源性压力与内生挑战时展开的适应性调适过程^[28]。

总体而言,上述两种视角分别从“政府”和“社会”维度解释乡村产业发展。但乡村产业发展作为乡村经济的重要变量,既受当地政治社会结构影响,也对地方社会与治理结构产生深远作用。有学者已关注到农村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再组织化效应^[29]。事实上,地方产业的经济驱动正是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甚至可能决定性地塑造当地社会结构与形态。然而既有研究存在局限:或对产业发展的社会结果做全景勾勒却缺乏微观机制分析,或把社会变迁结果作为探讨其他乡村现象的前提,鲜少关注社会变迁的发生逻辑,尤其忽视地方产业发展塑造地方社会的内在机制。为此,本文以东部地区一个典型内生型乡镇特色产业为案例,通过深度剖析其发展历程与地方社会形态,厘清产业发展对当地社会的影响与塑造路径,深入探究其社会效应的多维内在机制。

二、研究方法与案例呈现

(一)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是一种经典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注重回答“如何”和“为什么”的问题,强调结合现象所处的现实情境进行丰富描述^[30]。该方法能够较好地归纳现象特征、挖掘现象背后的潜在规律并提炼

理论逻辑^[31]。其目标并非叙事,而是产出诸如解释(原因)、理解(特征)或规范(原则)层面的知识^[32]。在殷(Yin)看来,案例研究更适用于三种情形:一是研究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二是研究者几乎无法控制研究对象;三是研究重点聚焦当前现实现象^[33]。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通过深入剖析典型案例,厘清“是什么”的问题,如地方产业发展的演进历程与形态结构、地方社会的形态与结构;二是进一步解答“为什么”的问题,即地方产业发展如何影响和塑造地方社会,其内在机制是什么。围绕经济发展的社会效应,宏观层面已有不少成果与判断;而案例研究可通过深度呈现具体实践,厘清更具体、细微且隐秘的机制。

(二)案例呈现:山下湖镇的内生型产业发展

山下湖镇是浙江省诸暨市内面积较小的乡镇,却是全国知名的淡水珍珠全产业链特色镇——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年产值约400亿元。该镇淡水珍珠年产量占全国80%以上、全球70%左右,拥有各类珍珠市场主体9000余家及国内最大珍珠交易市场“华东珠宝城”,被誉为“中国珍珠之都”。笔者于2023年7月5日至25日在山下湖镇开展了为期20天的深度田野调研。调研以半结构式访谈为主要方式,聚焦当地分管产业副镇长、珍珠产业村村干部、养殖户、产业工人、小作坊主、销售摊主,以及强村公司、直播电商公司等产业相关主体,完成深度个案访谈,全面收集了淡水珍珠产业一手材料。

山下湖镇的珍珠产业肇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长乐村的珍珠养殖,之后逐步延伸至全镇,最终形成多数家庭参与淡水珍珠养殖的产业格局。随着珍珠养殖规模的扩大,当地的珍珠交易、加工等后续产业链环节逐步完善,配套交易市场也经历多次场地升级。珍珠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以珍珠养殖为中心,产业链短、规模较小,但参与的当地居民数量多。然而,由于珍珠养殖存在养殖与市场双重风险,绝大多数小规模家庭养殖户逐步退出养殖环节,仅剩较大规模的养殖户或专业养殖公司。同时,珍珠产业的发展使整个产业链不断延长,加工、深加工、销售等中间环节持续壮大,市场交易规模也不断扩大。珍珠的产品形态也从“原珠”拓展到珍珠项链、首饰加工、工艺品以及珍珠药用、美容、保健品等多种类型。总体而言,山下湖镇珍珠产业已形成了相对分明的养殖、加工、销售三大环节。

首先,养殖环节是技术门槛高且资金投入大的产业链环节。珍珠养殖需依托种植珍珠技术、爱迪

生技术等市场适配性技术,这些技术对潜在从业者构成一定门槛。无论是山下湖镇本地养殖区域,还是珍珠企业的外地养殖基地,具体养殖工作均由本地人负责。同时,该环节资金需求较大:一方面,当前养殖规模下,种苗采购与日常养护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市场波动风险难以把控,往往需要延长养殖周期以规避风险。从用工来看,养殖环节劳动密集属性较弱,仅在种苗投放等特定阶段需集中雇佣熟练劳动力,本地村庄60岁以上老年人常被吸纳至这类弹性岗位。

其次,生产加工环节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链环节。该环节涵盖珍珠收购后的漂白、打孔、镶嵌、穿孔等工序,技术壁垒较低,主要依赖劳动力密集投入。由于生产加工环节具备开放性与可拆解性,资金和劳动力投入较为灵活——既有夫妻经营的家庭作坊,也有大规模雇工的专业加工企业。本地多数劳动力在此环节就业,珍珠产业旺季时,还会吸引山东等地的外来劳动力流入。相较于养殖环节,生产加工环节资金投入较少,利润水平偏低,但承担的风险也相应更低。

最后,销售环节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链环节。历经数代交易市场演进,山下湖镇华东珠宝城已发展为全球最大淡水珍珠交易中心,其场地租金、库存备货等均需大规模资金投入。尤其直播电商等新兴模式兴起后,珍珠消费群体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年轻消费者占比上升,线上直播成为核心购买渠道,这使得流量购置成本与库存成本持续走高。而直播带货的高周转率与高退货率特性,进一步抬高了销售环节的资本壁垒,形成头部企业主导的竞争格局,中小主体普遍面临参与难题。

总体而言,山下湖镇珍珠产业历经数十年发展,从萌芽走向成熟壮大,已成为该镇乃至整个诸暨市的重点产业之一,对当地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内生型产业发展塑造地方社会的机制与路径

要理解山下湖镇的地方社会结构与发展轨迹,珍珠产业是关键分析维度。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以来,这一淡水珍珠产业已深度重构当地经济结构与职业体系,更让当地市场与社会形成紧密的互构关系——市场的机会结构塑造社会结构,而当地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网络)又深刻影响产业利润分配。

从产业特性来看,本地珍珠产业呈现“非集聚”

的“分散化”特征,整个生产加工环节具备可分解、可拆解的属性,产业开放度极高。这种中间加工环节的“分解性”,全方位吸纳了地方劳动力,进而塑造了当地的家计模式:分散化的产业市场机会,让本地人能轻易进入产业链获取收益。在市场竞争与博弈中,部分家庭和群体脱颖而出,通过小作坊、小公司、小商铺等形式,获得超越单纯劳动力报酬的收益;而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勢的群体,也能通过在相关企业、作坊务工,或在正式工作之余打零工参与加工环节,赚取劳动力报酬。由此,市场机制推动本地农民出现经济层面的阶层分化:经商、创业成功的群体,家庭资源累积速度远超其他群体,形成新的社会阶层;其他群体则依托劳动力参与产业分工,维持生计。从这一角度而言,“产业—社会”的互动与互构,不仅是分析本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框架,更是理解地方社会运行逻辑的关键视角。

(一)内生型产业发展与地方社会的总体形态

虽然由于产业形态与特性的不同,内生型产业所塑造的地方社会形态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仍有一些总体性特征。概言之,内生型产业发展塑造的是结构完整的阶层分化社会。

一方面,无论何种产业形态,当其在地方社会内部逐步发展壮大时,都能为地方提供充足的市场机会。这些机会能有效吸纳地方社会中的主要劳动力,使其无需“离土离乡”即可获得市场化的就业机会。我国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正面临“有市场经济却缺市场机会”的困境^[34]。受此影响,中青年劳动力不得不前往市场区位优势、产业发展成熟的地区务工,进而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35]。这种普遍家计模式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中西部农村社会完整性被破坏——“老人、妇女、儿童”组成的“三留守”人员成为地方人口主力,人口数量少、结构不完整成为当地社会的总体形态。相较而言,地方内生型产业通过就业吸纳,减少了人口外流,甚至吸引大量外来人口流入。这使得地方社会保持相对完整,人口结构与家庭结构健全,社会关系与社会规范也能得到较好维系。正如山下湖镇珍珠产业的发展,不仅让本地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还吸引外地劳动力参与,避免了“留守”困境,维系了社会结构的完整性。

另一方面,产业发展带来的充沛市场机会是地方社会保持完整的前提,但市场天然存在的竞争性,会导致不同个体的市场获利能力出现分化,进而引发地方社会的阶层分化。在市场竞争的分化效应

下,个体处于市场利益分配的不同层级,这带来家庭资源积累能力的显著分化——资源积累效率的差距不断拉大,最终催生社会阶层分化。而产业形态的差异,往往会塑造出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有的地方产业集聚度高,地方市场的获利空间易被高度垄断。富裕阶层会通过居住形态区隔^[36]、日常生活的区隔化^[37]推动了阶层的固化与再生产。这种社会阶层的高度分化,还会使富人阶层主导的人情规则等,对底层阶层形成社会性价值追求与社会关系上的双重排斥^[38]。有的地方产业属于非集聚性类型,产业获利机会高度分散,则会塑造出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山下湖镇的珍珠产业便属于此类。但总体来看,地方内生型产业发展必然会带来较为显著的地方社会阶层分化,产业形态的差异仅会影响分化程度的高低。

(二)内生型产业发展形塑地方社会的三重机制

地方内生型产业发展何以塑造地方结构完整的阶层分化社会,可以从个体、家庭、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剖析。

1. 个体市场机会供给机制

地方内生型产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最直接的影响是为地方社会个体提供了充足的市场机会,这一过程深度塑造了个体的行为逻辑。在相对充沛的市场机会结构中,个体间的竞争随之展开,而市场的筛选机制会使个体的获利能力与获利空间出现分化:一小部分市场博弈与竞争能力较强的个体,能够抓住机会结构中的机遇,凭借自身能力在市场中占据优势获利位置,例如开办各类大中小型公司;另一部分竞争能力有限的个体,则会选择市场中风险较低、对能力要求不高的就业机会,其收入水平持平甚至高于外出务工收入。

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个体投身产业与市场,原本基于地缘关系的互助网络逐步瓦解,个体间的地缘关系趋向理性化——个体的社会关系网中,基于市场(利益)的建构性关系占比显著提升。这一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本地人更注重维系和拓展建构性关系,并依托亲缘网络、建构性关系网络等资源,力图在市场中获取更多获利机会。这种以市场利益为导向的关系重构,既是产业发展对社会关系的重塑,也是个体适应市场竞争的主动选择。

2. 家庭资源积累机制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更是个体社会行动的基本单位。家庭行动逻辑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计模式,是理解地方社会的重要维度。正如上文所

述,“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在市场和区位处于劣势的背景下,通过家庭劳动力的代际、区域配置,更有效地积累家庭资源,进而实现家庭再生产目标的理性选择。家庭资源积累是家庭实现生产与再生产目标的物质基础。在中国农民“家”本位的行动逻辑下,家庭资源积累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地方社会的形态。地方内生型产业的发展,让当地农民家庭拥有较强的家庭积累能力,能够给予子代有力支持。如此一来,子代的教育、家庭再生产以及子代家庭的市民化都能较好实现。因而,地方社会呈现出典型的在地城镇化现象,即本地家庭能完成较为彻底的市民化,在地方社会内部实现从“农村”向“城市”生活方式的彻底转型。这种转型依托内生型产业带来的家庭积累能力,是家庭行动逻辑在产业支撑下的具体体现,也进一步印证了家庭对地方社会形态的塑造作用。

3. 社会阶层分化机制

在个体与家庭层面之外,地方内生型产业发展对社会的塑造,还体现在地方社会的阶层分化上。产业发展与市场竞争带来的经济分化,直接导致地方社会内部出现显著的阶层分化。需要注意的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的社会虽因中青年劳动力参与全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经济分化,但由于中青年劳动力长期不在农村,这种经济分化并未转化为显著的社会效应。而地方内生型产业的发展让地方社会结构保持完整,经济分化所引发的社会分化——即阶层分化的社会效应得以充分显现:同一阶层内部的相互参照、不同阶层之间的对比与竞争等,都会对地方社会中个体与家庭的行为逻辑产生直接影响。

总的来说,地方内生型产业的发展从个体、家庭延伸至社会层面,通过个体市场机会供给机制、家庭资源积累机制以及社会阶层分化机制这三重机制,最终使地方社会形成了“结构完整的阶层分化社会”这一基于产业和经济的总体形态。

(三)山下湖镇珍珠产业塑造地方社会的实践路径

上文所述产业内生型发展塑造地方社会的三重机制,可以通过山下湖镇珍珠产业的具体案例来具体阐述。

1. 充分市场竞争与个体创业意识塑造

对于山下湖镇的农民而言,他们在集体化末期就已接触到珍珠养殖这一具有高额收益的非农生产。分田到户后,他们较早脱离了与土地和农业生产的绑定,投身于珍珠养殖产业相关的非农就业。

当地农民从珍珠养殖中获得了较高的非农就业收益,同时,这一产业也极大地激发和培养了他们的市场经营意识与创业意识。正如当地流传的说法:“八九十年代几乎家家户户养珍珠,挖几亩水塘就可以养了,很多人就是因为养珍珠很早就盖起了楼房。”

随着珍珠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从养殖、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逐渐形成,塑造出充沛的市场机会结构,实现了对本地劳动力全方位、全年龄段的吸纳。少数有资金、有技术的农民进入养殖环节,大多数本地农民则选择门槛相对较低的加工和销售环节。除适龄劳动力外,超过60岁的本地老年人依然能在养殖、加工等环节获得较高收益的劳动就业机会。有当地人表示:“我们这里的老年人到破蚌厂或者去养殖基地,随便打打零工每天都有两三百元的收入。”

产业的快速发展,让地方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在传统血缘、地缘关系之外,建构性社会关系也极为发达。本地农民借助这种建构性社会关系,拓展自身在产业和市场中的获利可能性。有受访的村支书坦言:“现在全市场就我一家做珍珠饰品质量鉴定的,这个机会就是当初和朋友喝茶喝出来的。”

而且,由于珍珠产业提供了充沛的市场机会,本地人有着极强的创业欲望和想法,并且总能积极实践。访谈发现,当地五六十岁的中年群体普遍有过各种形式的创业经历,有的创业成功,有的则遭遇失败,甚至有人在多次失败后回归为普通打工者。即便如此,本地农民依然有着强烈的创业想法,怀揣“老板梦”,他们不断观察、发掘市场中的各种机会,思考如何在市场中博弈、拼搏。这种对创业的执着和对市场机会的敏锐捕捉,让当地拥有了极强的社会活力。

2. 家计模式、代际关系与家庭再生产

珍珠产业的发展在给个体带来充足的发展空间和机遇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作为地方社会基本单元“细胞”的家庭。珍珠产业对当地家庭的影响和塑造大致可以从家计模式、代际关系以及家庭再生产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珍珠产业的发展形塑了当地以“工”和“商”为基础的家计模式。山下湖镇由于珍珠产业的存在,市场机会十分充沛,本地家庭中各个年龄段的劳动力都能被市场吸纳,并在市场中获得收益。由于家庭中个体把握市场机会以及博弈能力存在差异,少部分市场博弈的优胜者通过经商为家庭带来了更大收益,由此形塑了“工—商”代际分工的家计

模式,即家庭中的中青年劳动力经商,老年人则做工。这部分群体逐渐演化成为当地社会中的上层阶层。本地大多数家庭往往两代劳动力都以“工”为主,凭借多劳动力的较高就业收入以及较低的生活成本,实现家庭资源的有效积累。因此,本地家庭的家庭资源积累能力普遍较强,中年夫妻两人的年收入20万元以上是当地的普遍情况。“我们村一般的家庭,夫妻俩在珍珠工厂里面上班,下班了带点珍珠回来加工,一年加起来最少也能有个20万左右的收入,如果算上已经工作上班的子女的话那就更多了”。

其次,家庭资源积累能力的“代际双强”塑造了本地良性的代际关系。这种代际关系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空间整全性。与“半工半耕”模式下代际间的空间分割不同,本地不同代际之间空间临近或易达,能够实现常态化互动,由此形成“既亲又密”的代际关系。其二,平等性。父代并未出现依附子代或被“代际剥削”的情况,反而因较强的家庭资源获取与积累能力在家庭中拥有话语权,与子代保持平等且理性的关系。这种平等关系让父代无需退出村庄人情社会关系网络,他们能通过积极参与社会交往获得社会性价值,正如当地人所说:“我们现在村里面走人情我走我的,我儿子他们家另算一份。”

最后,是向上流动的发展型家庭再生产。有学者将中国农民家庭再生产划分为导向维持型目标的“简单再生产”和导向发展型目标的“扩大再生产”两种模式^[39]。依托珍珠产业发展,本地家庭获得较多资源剩余,这些资源能有效转化为子代家庭的成长与发展条件——不仅实现了家庭再生产目标,更达成了家庭向上流动与市民化的目标。因此,即便本地年轻人婚姻负担不轻,一般家庭也能为子代提供有力支持,承担买房、买车、彩礼等婚姻成本,助力子代家庭完成再生产并顺利市民化。且这种市民化因珍珠产业的存在而具有本地化特征,子代家庭自身资源积累能力较强,无需父代家庭持续“输血”。

3. 低分化、达标式竞争与社会结构扁平化

珍珠产业的发展除了对个人以及家庭等的影响之外,对地方社会的整体性质和结构亦产生了重要影响。地方产业的这种整体性社会影响大致可以概括为阶层的低分化、达标式竞争以及由此形塑的扁平化的社会结构。

显然,山下湖镇的珍珠产业是具有“非集聚”和“分散化”特征的开放式产业,本地人都可以凭借其家庭资源和自身能力的禀赋在市场中找到适合自己

的获利机会。绝大部分本地人在产业链中虽然因“工”和“商”存在阶层分化,但阶层之间的距离并不远,处于低分化状态。这种低分化体现在不同阶层之间无论是居住空间还是日常生活都未出现明显区隔。

由于当地村庄社会长期保持相对完整,地方社会的社会规范与社会评价功能得以有效发挥,本地农民对村庄内部的社会评价颇为看重。绝大多数村民会积极参与村庄人情往来等社会交往,以维系在村庄中的“面子”。不过,这种村庄“面子”存在阶层分化特征,即村民“面子”的竞争与比较对象仅限于同阶层的其他村民,不会跨阶层展开。因此,本地社会阶层竞争呈现为“不低于”同阶层一般水平的“达标式”竞争;核心是达到所在阶层的普遍标准,或是他人认可的应有标准;若未达标,不仅会在村庄舆论中形成负面评价,还会失去“面子”。这种竞争模式使得当地社会阶层分化程度低,竞争烈度温和,未对不同阶层造成过重竞争负担。正如当地人所说:“现在大家办酒主要看家庭情况,像我只要不低于我们一般家庭的标准就行,那些家里更有钱的老板有的标准高得很,桌上放的都是五粮液,这哪能比。”

阶层低分化与阶层内部的达标式竞争,共同构成了当地相对扁平化的社会结构。更关键的是,基于“商”与“工”的阶层分化并非完全固化,而是会随珍珠市场波动自然流动。即市场行情低迷时,高阶层可能因经商失败跌落;市场行情向好时,低阶层也可能抓住机遇实现阶层跃迁。这种阶层流动性,正是阶层低分化及扁平化地方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

综上所述,山下湖镇珍珠产业的发展从个体、家庭到社会三个层面对地方社会的基本单元与深层结构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最终塑造出当地“结构完整的低度阶层分化”社会形态。

四、结 语

既有研究聚焦地方政府在产业中的角色及市场行为的社会建构,却因经济影响的长期性与隐蔽性,忽略了内生型产业对东部发达地区社会形态的形塑机制探讨,而这恰是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动力的关键命题。本文通过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珍珠产业与社会的深度案例分析,具体探讨地方内生型产业发展对地方社会的塑造路径,厘清地方产业发展的社会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概言之,内生型地方产业的长期发展,通过个体市场机会供给、家庭资源积累以及社会阶层分化三

重机制的综合作用,塑造了结构完整的阶层分化社会。具体而言,此类产业提供了充沛的市场机会,吸纳大量劳动力参与产业活动与市场竞争。个体资源禀赋和能力的差异,导致市场参与者在竞争过程中自然分化:竞争力较强的个体获得高额收益,而竞争力较弱个体亦能通过劳动力实现价值转化。地方产业由此决定了本地家庭的家计模式,并通过显著增强家庭剩余资源的积累能力,重塑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与再生产模式。而个体及家庭层面的经济分化,最终驱动了地方社会的阶层分化。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形态和产业性质的差异会导致产业发展对地方社会的塑造效果各异,阶层分化程度亦随之不同。正如山下湖镇的案例所呈现的,珍珠产业的“非集聚”“分散化”特征,使其塑造的社会呈现“低度阶层分化”形态。发达地区农村的社会变迁,凸显了经济与产业因素的关键驱动作用。本研究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旨在为理解地方社会变迁及产业与社会关系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维度。

参考文献:

- [1] 吴重庆. 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J]. 读书, 2011(1): 19-25.
- [2] 贺雪峰. 论半熟人社会: 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J]. 政治学研究, 2000(3): 61-69.
- [3] 杨华, 杨姿. 村庄里的分化: 熟人社会、富人在村与阶层怨恨: 对东部地区农村阶层分化的若干理解[J]. 中国农村观察, 2017(4): 116-129.
- [4] 赵旭东, 张文潇. 乡土中国与转型社会: 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9(1): 26-37.
- [5] 刘守英, 王一鸽.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J]. 管理世界, 2018, 34(10): 128-146.
- [6]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4.
- [7] 林炳玉. 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与村党组织建设[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5(3): 84-90.
- [8] 邱成利, 冯杰. “苏南模式”的发展及其路径依赖[J]. 中国工业经济, 2000(7): 51-55.
- [9] 费孝通. 费孝通全集: 第十六卷[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312.
- [10] 周飞舟. 回归乡土与现实: 乡镇企业研究路径的反思[J]. 社会, 2013, 33(3): 39-50.
- [11] 付伟.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乡村产业及其社会基础: 以浙江省L市偏远乡村来料加工为例[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6): 71-90.
- [12] 沃格尔. 市场治理术: 政府如何让市场运作[M]. 毛海栋,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6.
- [13] 周黎安. “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J]. 社会, 2018, 38(2): 1-45.

- [14] Oi J C.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J]. *World Politics*, 1992, 45(1): 99-126.
- [15] 古学斌,张和清,杨锡聪. 地方国家、经济干预和农村贫困:一个中国西南村落的个案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4(2): 79-88.
- [16] 冯猛. 基层政府与地方产业选择:基于四东县的调查[J]. *社会学研究*, 2014, 29(2): 145-169.
- [17] 符平. 市场体制与产业优势:农业产业化地区差异形成的社会学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8, 33(1): 169-193.
- [18] 孙德超,曹志立. 产业精准扶贫中的基层实践:策略选择与双重约束:基于A县的考察[J]. *社会科学*, 2018(12): 3-13.
- [19] 冯猛. 项目化时代农村地方产业的风险分担机制:以特拉河镇大鹅产业为例[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2): 28-37.
- [20] 波兰尼. 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M]. 黄树民,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13.
- [21] White H C. Where do markets come from?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1, 87(3): 517-547.
- [22] 刘燕舞,姚巧华.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产业发展的微观社会结构研究:基于四个村庄案例的分析[J]. *贵州社会科学*, 2021(12): 143-150.
- [23] 焦长权,周飞舟,王绍琛,等. 祠堂与祖厝:“晋江精神”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J]. *东南学术*, 2015(2): 21-27.
- [24] 杨善华,孙飞宇. “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J]. *社会*, 2015, 35(1): 74-91.
- [25] 付伟. 农业转型的社会基础:一项对茶叶经营细节的社会学研究[J]. *社会*, 2020, 40(4): 26-51.
- [26] 彭晓旭,张慧慧. 产社一体:内生型乡村产业振兴路径及其效应:基于马村鞋垫产业的考察[J]. *农村经济*, 2022(5): 107-115.
- [27] 赵秋倩,王进,夏显力. 资源贫乏型乡村如何实现内生发展:基于西部地区D村的乡建之路[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9): 58-67.
- [28] 孟庆渡. 村社本位与乡村产业新内源性发展的实践逻辑:基于陕西省和县方村的个案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1): 106-117.
- [29] 马平瑞,李祖佩. 农村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的社会效应:基于鲁西南蔡庄村的个案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 2023(4): 151-168.
- [30] Eisenhardt K M, Graebner M E. Theory building from cas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1): 25-32.
- [31] 黄江明,李亮,王伟. 案例研究:从好的故事到好的理论: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理论构建研究论坛(2010)综述[J]. *管理世界*, 2011(2): 118-126.
- [32] 张静. 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8): 126-142.
- [33] 罗伯特·K. 殷. 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M]. 周海涛,李永贤,张薏,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 8-13.
- [34] 贺雪峰. 人际关系理性化中的资源因素:对现代化进程中乡土社会传统的一项评述[J]. *广东社会科学*, 2001(4): 139-145.
- [35] 夏柱智,贺雪峰. 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12): 117-137.
- [36] 刘超. 农民居住形态与阶层分化:浙江例证[J]. *重庆社会科学*, 2017(3): 63-70.
- [37] 印子. 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与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基于浙北农村调查的分析[J]. *北京社会科学*, 2015(7): 68-74.
- [38] 杜姣. 内生型工业村庄人情面子竞争与阶层关系建构:以浙北D村为例[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6): 52-57.
- [39] 李永萍. 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7(2): 44-60.

(责任编辑:陈丽琼)